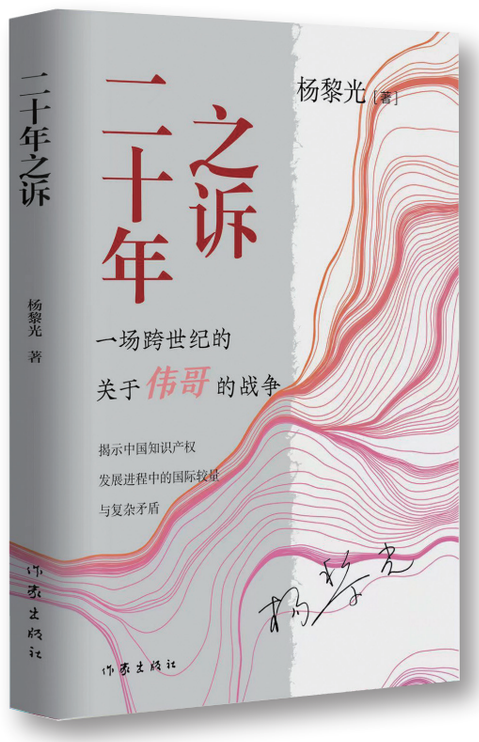
硬题材、深内涵、新思考的优秀之作

——读杨黎光长篇报告文学《二十年之诉——一场跨世纪的关于伟哥的战争》

□张 陵



作家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二十年之诉——一场跨世纪的关于伟哥的战争》，以一场旷日持久、至今仍然没法结束的法律诉讼为切入点，展开了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状况的深入描写，重点讲述了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企业与美国医药大鳄辉瑞公司的商标之争的故事，反映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无序到规范、从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到积极运用国际规则主动参与国际较量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国际知识产权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和深刻性，引发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时代条件下，思考中国如何走向世界、如何融入创造全球发展新时代的大问题，由此突出了其视野开阔、格局宏大的思想主题。

《二十年之诉》抓到了一个好题材，也抓到了一个硬题材。说其“好”，是因为“伟哥”从研发生产到投放市场以来，一直是全世界热销的商品，围绕“伟哥”所引发的各种官司不断，群众关注度很高，是个持续不断的社会热点。官司背后那些深层次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应该都是报告文学作家最感兴趣也是读者最感兴趣的内容，题材新颖独特，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说其“硬”，显然是说这个题材很难把握、很难掌控，国际知识产权的斗争与较量与国家利益、国家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复杂严峻的问题，只有政治素质好、思想水平高、文学能力强的作家才敢触及，才能拿得住、把得稳、写得好。杨黎光正好是这样的作家。在他那里，硬题材反而更能激发起他的创作热情，激活他思想艺术挑战的冲动。只要他准备好了，题材也就不“硬”了。

《二十年之诉》举重若轻地从2020年3月10日，由现在“伟哥”商标真正的拥有者深圳凤凰公司起诉大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广东壹号大药房侵害“伟哥”商标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的“标示性案件”说起，回溯了20年来由“伟哥”不断引发的诉讼。其实，第一场轰动整个中国医药界的法律战争是由辉瑞公司发动的，对准的是沈阳飞龙药业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东北能人”、中国药业的传奇人物姜伟。今天看来，这个姜伟的传奇性主要表现在胆子特大、不计后果，用超常规的营销策略也就是疯狂炒作来占领市场，称之为“营销之王”更为准确。为了破解公司出现的严重困局，他于1998年12月，以向国家商标局申报“伟哥”商标成功的名义，在国家商标局还没有批准的情况下，石破天惊地推出号称潜心研发6年的“伟哥开泰胶囊”，被当时的媒体称为“20世纪末最大一桩无形资产生意”，引来了世界媒体的轰炸式报道，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其实这不过是一次商标的抢注行为，背后还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而“洋伟哥”美国辉瑞公司则于1999年12月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对伟哥开泰以侵犯商标权的名义采取法律行动”。看似云淡风轻的表态，后果却是国家以“劣药”的名义，对“伟哥开泰胶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清理查处行动。“伟哥开泰胶囊”的信誉一落千丈，一下子成了丧家之犬，人人喊打。

《二十年之诉》描述了这一事件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事件，显然是想反映中国知识产权发展史上一个时期的现实。一是近乎无法无天的混乱无序局面。姜伟这个风云人物看似敏感胆大，什么都敢干，但到底还是有基本的法律意识，只是想打一个法律的擦边球，搞所谓的“借船出海”。由于“伟哥”的市场前景广阔，利润太大，后面跟进的那些药企，完全是不顾一切、几近疯狂，他们不是在抢注，而是在抢钱，更有甚者，一批犯罪分子也乘势而上，如闫永明、王奉友之流。前者为通化金马公司的董事长，通过生产“奇圣胶囊”大肆捞钱，带着2.5亿美元逃到新西兰，进入“红通”名单。后者完全把“洋伟哥”西地那非的成分直接拿来，变成“蚁力神胶囊”，还得到诸多社会荣誉，最后被揭露出来，是个天大的骗局。可见当时的中国药业局面有多么混乱，也逼得国家不得不下狠手整顿。二是国外跨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辉瑞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神气与豪横。从作品中我们得知，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创新药研发巨头。他们研发的“万艾可”在全世界掀起一场“蓝色风暴”，获得了巨额利润。“万艾可”以其强大的资本力量和公关力量抢占中国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彼时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建立，各种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辉瑞成功掌握和利用这种文化生态，为自己打开中国市场、夺得竞争优势，它自然不允许中国的医药企业对其形成竞争挑战态势，必须动用各种力量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这种跨国公司的霸凌气、大手笔，与中国药企的可怜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姜伟们一边打着擦边球，一边喊着“民族工业保护”来给自己打气，其实都是一些雕虫小技。三是中国正在为申请加入WTO进行艰苦的谈判。所谓艰苦，很多时候即表现在知识产权上的拉锯与争夺。作品写了一个细节：当年邓小平访美，与美国签订协议，美国就附加了一项知识产权的条款。但当时的中国代表团里没有一个人懂知识产权，不得不紧急打电话回来找专家咨询。实际上，申请加入WTO时碰到的知识产权问题更多更复杂，有很多陷阱，一不小心就会使国家利益受损，很多时候不得不长时间权衡利弊。我们是在没有知识产权优势的条件下，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知识产权的不对等谈判。因此，国内的乱象必然要整治，以配合国家谈判顺利进行。所以中国的药企经常是要受一些委屈的，要做出必要的牺牲，这也使得握有知识产权利刃、财大气粗的辉瑞更为豪横。

《二十年之诉》在文学化地普及知识产权知识的同时，还提醒我们，要注意美国曾经是世界知识产权最大偷盗者这一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大量数据表明，在工业革命时代，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山寨国，用金钱开道、间谍窃取等方式打开了一条科技进步之路。难怪有历史学家说，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领袖的方式，乃是借助其对欧洲机械及科技革新成果的非法占用。正是因为美国享用了太多窃取别人成果的好处，才会在后来成为创新能力强大的国家时，制定完善的知识产权游戏规则，来保护本国高新科技成果不受别人侵犯，也不断拿知识产权来苛刻地卡发展中国家的脖子，对他国进行经济盘剥。这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是美国跨国集团的经营策略。辉瑞在中国市场的所谓知识产权策略，具体表现就是没完没了地打官司，即国内药企恨之入骨的“缠讼”。其中虽然有保护自己专利的正当目的，但也带着明确的阴损目的。作品分析到，辉瑞公司的最大目的已经不是官司的输赢，而是利用自己的绝对实力，以诉讼为工具，压制对手、拖垮对手，赢得时间和市场。国内的很多药企就吃尽这一阴招的苦头，失去了发展机会。其实辉瑞的这一招数，与美国政府的“知识强权”一脉相承。

《二十年之诉》所突出的一个思想观点就是，中国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只有不断自主创新，才有可能在世界知识产权较量中争取主动，获得应有的话语权。所以，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国家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作品不无遗憾地写到，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研究出来的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由于当时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这个在当时中国医药唯一具有全部知识产权的创新，获得了世界声誉，却没有获得世界市场，甚至连中国市场的发展也很不充分。这是一个深刻教训。

正是在深入思考创新与知识产权深刻关系的层面上，作者认为，在这场“伟哥”战争中，多数中国药企并不是辉瑞的对手，就算组成“伟哥联盟”的强大阵容，也无法战胜对手。并非辉瑞资本有多雄厚、背景有多大，而是辉瑞有真正的实力。如果我们承认辉瑞具有世界上最强的新药研发能力的话，那么就能发现，辉瑞最大的实力在于创新。有创新，才有知识产权的实力。而“伟哥联盟”中的多数中国药企并没有这种创新能力，只有仿制能力。作品援引有识之士的观点：在与辉瑞的法律较量中，多数企业虽然具备了初步的法律意识，但“在摧毁对手的专利后，他们首要的目的并不是要创新，而仅仅是为了清除专利障碍以方便仿制”。辉瑞的“万艾可”也曾在英国被判“专利无效”，但辉瑞以外的公司仍然不能仿制这种药。而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万艾可’用途专利被仲裁无效，这种药品就会裸露到阳光下，任人仿制”。中国企业如果抱着这种目的打官司，如果赢了，实际上也可能是一场知识产权的灾难。正在适应WTO规则、正在建立知识产权机制的国家管理部门，是不能让这样的“灾难”发生的。在这样的差距之下，辉瑞自然无敌手。

然而辉瑞实际上一直有真正的“敌手”，这个对手就是在中国土地上不断成长的创新药研发企业广州威尔曼公司。董事长孙杰明就不怕辉瑞的“缠讼”，有来有回、斗智斗勇，官司打得风生水起。作品梳理了公司的历史，“辉瑞公司为了争夺‘伟哥’商标，孜孜不倦地与该商标的最终权利人威尔曼公司和深圳凤凰公司进行了近20年、前后多达5轮、涉及两条战线和多个案件的马拉松式的诉讼”，“伟哥”两字的商业价值由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基本事实是，威尔曼公司的“伟哥”成分是以甲磺酸酚妥拉明为主，辉瑞公司的“伟哥”是以西地那非为主，并不相干。“伟哥”这一商标是由威尔曼公司于1998年6月2日申请注册的，于2002年6月21日进行商标公告，占据法理的制高点。但由于辉瑞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异议，该商标至今还未获准注册，由此留出了较量的空间。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药企被对手无谓的诉讼拖累，丧失发展机遇，却也必须承认，这种较量也是企业进步的动力。中国药企就是在这种复杂严峻的条件下，建立起知识产权意识，学会在市场经济中游泳，打开竞争世界的大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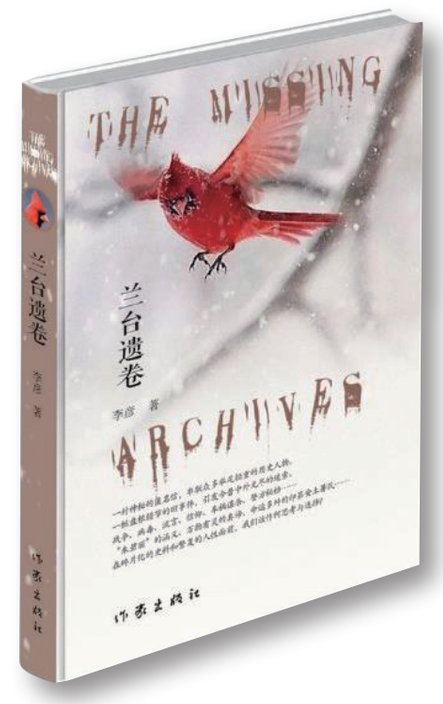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年之诉》不仅把华彩的一笔给了中国的威尔曼公司，也给了美国的默克公司。20世纪70年代以来，乙肝在中国大爆发，我们国家自己的疫苗无法满足人民需求。在这个紧要时刻，美国默克公司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向中国转让现有生产重组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培训中方人员，确保在中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监测显示，接种疫苗后，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表面抗原感染率降低了90%，15岁以下儿童预防了约1600万至2000万例乙肝病毒携带者，累计避免了280万至350万人死于由乙肝发展而成的肝癌。默克公司认为，药物是为人类而生产的，不是为追求利润而制造的，体现出了伟大的人类之爱。今天，这种人类之爱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得到赓续。中国的新冠疫苗正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给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民，挽救人民的生命。包括威尔曼公司在内的中国疫苗研制企业，为全球抗疫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写默克公司的这一笔，给人以温情暖意，也使作品主题得以丰厚，思想得以升华。

《二十年之诉》写的是“伟哥”商标之争，却站位高远、视野开阔、格局宏大，从这一典型案例中，看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风云和时代浪潮，看到了民族企业在世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的艰难成长过程，看到了融入世界的中国经济不断把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的智慧和实力。在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是一部兼具开拓创新精神和思想冲击力的优秀作品。

中国革命史中不应被遗忘的故事

——读李彦《兰台遗卷》

□苏 虹



作为一名外国人，白求恩在中国的知名度应该说是相当高的。这固然与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有关，但更多人了解到白求恩这位加拿大人，则是通过毛泽东同志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对白求恩有非常高的评价，比如评价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再比如称道白求恩“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但关于白求恩个人的情况，信息非常有限，只说他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中“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让白求恩的身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也不由得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直到最近读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兰台遗卷》，总算解开了堆积心中多年的谜团。

《兰台遗卷》是加拿大华人学者李彦女士的新作，据说原先的书名中，还有一个副标题，“中国革命不应被遗忘的故事”。书中除白求恩外，还涉及中国现代历史中许多重要人物，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外国友人如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对这样一部涉及众多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作品，我相信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这本书的编审，应该都会持非常严肃和审慎的态度。也正因为这样，我对这部非虚构作品多了几分推崇。

《兰台遗卷》从一封英文撰写的匿名举报信及其附录的中文资料开篇，举报对象是李添媛女牧师，所涉及的中文资料是李添媛撰写的一些文章。蹊跷的是，匿名举报信附录的这些资料，却被神秘的揭发者在关键之处作了“断章”处理，这也驱使作者要一寻究竟。随着作者抽丝剥茧的调查，当年一些同情、支持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及其后代，其离奇死亡的内幕也得以大白于天下。

囿于篇幅限制，只谈谈其中关于白求恩的一些内容。当年白求恩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胸外科专家，早在1935年11月就加入共产党，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加拿大党组织要求各方严格保密，不得对外泄露其党员身份。但是，在50年后解密的加拿大警方1936年11月6日的秘密档案上，有一页纸只有一行字：“据可靠情报确认，白求恩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即便是已经解密的档案，仍然是藏头盖脚。1937年春天，白求恩从西班牙战场回到自己的国家，由于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遭到原先所在医院的解聘，陷入失业窘境。

1937年夏天，白求恩根据加拿大共产党组织的安排，横跨北美大陆，为西班牙内战做募捐，频繁进行巡回讲演。皇家骑警总部下达通知，勒令各地警察分局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加拿大对共产党的“监视”，可不是仅仅“监视”这样简单。1932年，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巴克等人被捕入狱，并被起诉为“思想政治犯”。不久后监狱中发生了一场骚乱，尽管蒂姆·巴克并没有参加骚乱，但在平息过程中，警方的子弹却像长了眼睛一样，从一面窗口准确射入了关押他的牢房。事后调查发现，这完全是警方嫁祸于人的卑鄙伎俩。

在被加拿大共产党组织安排来华前夕，白求恩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假如我不回来了，你们必须要让世人知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牺牲的。”而在此前被加拿大警方窃取的白求恩书信的草稿上，他曾写下肺腑之言：“假如我对共产主义能够产生出强烈、真诚的感觉的话，那么，即便我的生计和专业地位受到威胁，我也会在所不辞。”显然，白求恩已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才踏上视死如归的征途。

当白求恩横跨北美大陆为西班牙内战演讲募捐时，他所表现出的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曾让其拥有无数“女粉丝”。针对坊间捕风捉影的猜疑和诋毁，加拿大华裔总督伍冰枝女士曾在自己撰写的白求恩传记中这样评价：“白求恩的生活里，出现过许多女性。他也曾倾心热爱过她们中的某些人。但他绝非一个追逐女性的男人，更从未试图征服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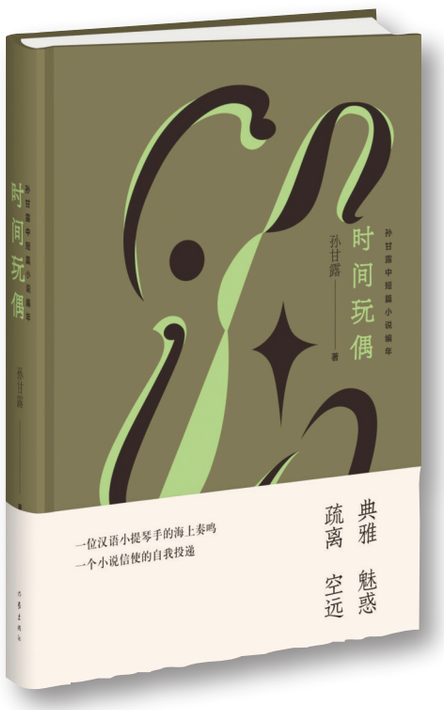
白求恩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与蒙特利尔一位聪慧美丽的左翼女画家玛丽安·斯科特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恋爱。白求恩在此后的一封信中，用细腻的笔触，剖析了不当情感所引发的矛盾心理：“如今我深感欣慰，因为咱俩都没有从身体上互相占有对方……你得以保存了完善无缺的贞操感和道德感，因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忠实的妻子。”而踏上中国大地后，白求恩彻底摆脱了男欢女爱的干扰，不再卷入任何恋爱纠纷，升华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兰台遗卷》披露了在当年的白色恐怖下，发生的许多针对共产党人的诽谤、诋毁甚至暗杀事件，令人触目惊心，掩卷难忘，反过来让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当年在《纪念白求恩》中所讲的“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有了更深理解。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如此寻踪觅源，拨开层层历史迷雾，不是故弄玄虚，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更好地将历史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对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认清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书 摘

情感化石

□孙甘露



下午，他们漫步在小公园的水泥道上。公园不太大，你可以听见外面汽车驶过的嗡嗡声，不远处大楼里传来的音乐声。他们许久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沐浴在夕阳中的落叶。你可以闻到树叶的香味，淡淡的，从你的周围慢慢地聚拢来。公园里几乎看不见游人了。只有香樟树叶浮动着，开始不停顿地扑向土地。那是春天。

他们在公园里一共只待了15分钟，没说一句话，就在公园门口分手了。和15分钟前一样，他们相互注视了一眼，也没照往常那样握握手，然后一同穿过马路，走了。他们谁也没从对方的眼里看出什么，察觉什么，两次都没有。他们生怕自己的秘密叫过路人瞧见。但他们谁也没有抑制自己。

他们总是在这个公园里见面，有好几年了。每次分手时，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雨天顺延。有时，他们中间的一个来了，而不见另一个。这常发生在局部地区有雨和有时阴有时有雨的日子里。他们从没通过电话，这就免不了白跑。几年间，他们经常相视而笑，在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们从没有吻过对方，尽管有好几次他们都从对方微张的嘴唇上看到了欲念。

他们在雨天，同打过一把伞，他们同去看过一场电影，但座位隔着走廊。为赶那场电影，他们又一同去挤电车，一大群陌生的人把他们拥到一块。他们闻到对方的气息，他们惊讶而又努力地分辨着。因为车厢里空气的成分实在复杂。

他们像所有的人一样匆匆地赶路。他们又像所有的人一样，作悠闲到不自在的散步。他们从没下过饭馆，每次约会他们都带着钱，可他们心想不能叫对方掏钱，而又怕对方硬想掏钱可又没带够数。他们相互间交换过一个理想，但因对方的理想与自己的相去不远，感到一种莫名的沮丧。他们总是设想对方有一个远比自己高得多的理想。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信心，因为他们总是在一个有阳光的日子里相会。

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真是这样吗？），他们分手了，并不是对方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弱点，也不是因为通过接触对自己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他们在转身的一瞬间，在心里祈求这个世界相安无事。不要因为他们两人曾经像老熟人一样会意地微笑，今后像从没见过似的漠然相视、擦肩而过而无端地生出许多是非来。他们相信自己永远善良，他们鼓励自己永远记住对方，不要因为将来的某一方面歪曲对方。他们为自己的淳朴而激动不已，同时又为自己的成熟和冷静分析而暗暗得意。他们几乎同样都忘却了公园，这个他们经常约会的地方。他们一定发现这个公园一无可取，因为它毫无特点，犹如他们自己。

……

依然是在下午，一个将会有晚霞的下午，香樟树叶又开始坠落的时候。作者听到了音乐声，最好是柴可夫斯基的。另外，作者还想到了一些格言，看到了一些精彩的绘画。于是，给他们带来了光彩，他们也给作者带来了可以表现光彩的机会。因为，他们由于一个偶然的缘由，由于都没有忘记对方，由于都没有另找新朋友，由于年龄都长了一岁，由于好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也由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们重又走到一起来了。

作者下决心要写出他们性格中光彩夺目的一面，写出他们的感情涟漪，一反从前那种不动声色的单调气味。他们绝不是那样的。

于是，作者和读者一同看到，他们又在公园门前相遇了，他们熟练地握了握手，互相凝视了片刻。他们似乎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他们忘情地凝视，心里充满了温情。他们几乎同时想到不到公园里去了，他们为什么早没想到上大街逛逛呢？就这样，他们永远地告别了只有在春天才落叶的香樟树，告别了这个没能给他们之间带来乐趣和美的小公园，告别了仅有的宁静和偶尔才能体味到的早春的温暖，重又回到充满了喧响和流动的生活中去了。他们以一年的别离为代价悟到了这一点。他们需要另一种宁静。那是在繁忙中刹那间的一瞥，是在匆匆行走中因石子路的不平坦而大不乐意的停顿，是在柜台前挤来挤去时全神贯注的凝视，是在急诊室里因安乃近注射而心惊肉跳的深呼吸。总之，他们和谐了，他们开始不紧不慢地在大街上晃悠。他们不去注意观察对方的神态，以便从中窥视对方心灵深处的秘密，他们相敬如宾（谁也分辨不出他们是在热恋还是早已成婚），他们融为一体了。

如果读者没有意识到，作者有义务在此做一提醒，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呢？那惊心动魄而又能深刻揭示人物的灵魂，同时反映社会现实的一幕上哪儿去了呢？没有那关键的一段，这算什么小说呢？如果真是这样，作者也毫无办法。作者丝毫不想隐瞒，作者曾在那个小公园里目睹了一切，只是公园中的一切，而那背后的一幕上哪儿去找呢？作者当时是应该上前拉住他们问一问的。可谁知道呢，作者以为他们还有像从前那样再来公园的时候。于是，当香樟树叶再落的时候，作者打算再去公园瞧瞧。

（摘自《时间玩偶：孙甘露中短篇小说编年》，孙甘露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8月）